

# 洞察时代气象 创造文艺精品

优秀合唱作品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合唱就是在用纯美歌声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 用歌声讲好中国故事

杨鸿年

我与童声合唱结缘，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从小就喜欢音乐，母亲会唱很多民歌，劳动时总是曲不离口，休息时也哼唱不断，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会用歌声倾诉自己的心声。我幼时耳濡目染的是淳朴自然的民间音乐，后来接触到引人向善的合唱音乐，从此在心中埋下合唱的种子。少年时期一位同学的母亲是钢琴教授，她发现我酷爱音乐便主动教我钢琴和作曲，一直供养我读上大学。“老师爱我，我爱孩子”，那时我就暗下决心，将来要培养更多孩子来报答老师。

1983年，当时的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计划创建高水青少年合唱团，我有幸担任组建及教学工作，这个合唱团就是现在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前身。35年来，合唱团为祖国赢得很多荣誉，我也在从事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中获得幸福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美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孩子们高尚的情操、正确的审美观以及团队精神。合唱团如同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用歌声将大爱的种子撒满人间。在国内，我们一开始就到贵州、广西为音乐教师演出，以推动边远地区国民音乐教育发展，也借此锻炼队伍，更是让孩子们懂得什么是“爱”。第一次访美期间，合唱团到一所养老院演出，一位老人在听了孩子们演唱后感动地说：“我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而中国小朋友却把爱和温暖送到我们心里。”每当看到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孩子在台上共同讴歌和平与友谊的动人情景时，我总是禁不住流泪，看到他们我就看到美好的未来。

少年强则国强。我在创建合唱团时曾说，“大家起点都是一样的，只要给予科学、优良的教育与训练，就能达到国际水平。”用最优秀的师资教育孩子是我们专业艺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1987年，合唱团第一次出国参加第三届国际童声合唱节演出，就获得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的“最高鉴赏证书”。如今，已培养近5000名热爱音乐的孩子，积累3000余首中外合唱精品，演出近千场，足迹遍及欧、亚、美等诸多国家，先后荣获30余个国际奖项。2017年在意大利参加欧洲最高水平的第六十五届童声合唱节，战胜其他13个国家14个成人合唱团，赢得总冠军。这无疑是合唱团多年来坚持严格训练的成果，体现了“一切从孩子抓起”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习近平同志说过，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合唱团就是在用纯美的歌声讲好中国故事。优秀合唱作品往往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以歌声为纽带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常常最为直接有效。我们第一次应邀赴美国演出时，《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称赞合唱团是在“以悦耳动听的歌声传播友谊的种子”。我们应邀赴奥地利演出，时任总统基希施塔格及夫人特意从休假地赶来观看演出，听完音乐会后说：“这样好的音乐会应该让全维也纳人听到。”1996年赴意大利参加国际比赛时，当地一位近90岁的老奶奶说：“我这辈子有一个愿望，就是去一次中国，但没能实现。今天听到中国孩子们的歌声，也算了却了心愿。”——我们一次次的国际交流活动中深刻体会到音乐尤其合唱艺术的“桥梁”作用。1992年我与严良堃先生共同倡议举办中国国际合唱节，如今已举办14届，旨在进一步通过歌唱促进跨文化交流与传播。

具体到合唱研究和教学，我有一些心得愿和大家分享，比如歌唱艺术的核心之一是对音乐“语感”的培养。语言是音乐风格的重要载体，我提出“音素中心部位处理法”，以有效适应合唱艺术共性规律的同时，突出不同合唱作品的风格个性。演唱中，我们一般强调字头轻、字腹长、字尾收，但在实际处理作品时往往既要遵守语言发音规律，又要服从音乐形象需要，打破规律。通过大量不同风格的作品训练，孩子们就能感受到这些微妙而又丰富的差别。当我们的合唱团演唱不同国家经典作品时，常常被国际同行评价为“纯正的法国风格”“纯正的意大利风格”……这并不是因为孩子们准确掌握了每一种语音，而是因为从音乐角度去认识语言，把握住了音乐的语感。

合唱艺术以共性为基础，讲求“谐和”与“平衡”。合唱队员只有相互倾听、彼此感受并默契配合，才能展现和谐的艺术之美。交响乐亦如是，二者都体现共性与个性的完美统一。因此我认为交响乐与合唱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整体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我所做的只是基础性工作，最终我们应建立合唱指挥学、合唱训练学、合唱风格学、合唱语言学、合唱创编学以及合唱美学等一整套学科。

时间一晃，我与合唱团已共同度过35个春秋。在与孩子们一起荡漾在音乐海洋的同时，我完成中国第一本《童声合唱训练学》书籍和音像制品，这是我“从孩子们中来，到孩子们中去”的结晶。今后，我要更加珍惜这有限时光，继续以强烈的使命感做好手中这份事业，继续和年轻朋友们一起追梦。

杨鸿年，出生于1934年，祖籍江苏六合。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终身学术委员，曾任世界合唱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音乐教育促进会副主席。创建并担任艺术指导及常任指挥的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被誉为世界三大童声合唱团之一。创编有《引子与托卡塔》等大量合唱作品，著有《合唱训练学》《童声合唱训练学》《乐队训练学》等。曾获“中国合唱终身成就奖”等。

述不可能指导作家生动地描写一个客厅，或者帮助雕塑家鲜活地再现一个农妇的神情，但是，哲学可以赋予艺术家仰望星空的心胸。相较于普通作品仅仅呈现世界的一个片断，经典作品通常在片断之中最大限度地寓含“道”的内涵，“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这绝不是鼓励艺术家平面地论证或者图解哲学表述，而是强调提炼、挖掘各种具象的深刻内涵。一些时候，艺术作品引申的内涵可能突破传统哲学表述，催生新的哲学思考。这即是文艺与哲学的互动、感性、审美与理性思辨的互动。许多艺术家隐约觉得，高蹈的哲学往往缺乏实用性——他们更愿意从事实用型的“技艺”训练。事实上，哲学的意义是提供宏观思想方位。如果说，驱动艺术家想象的时常是具象，“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那么，“思接千载”或者“视通万里”的宏观视野欠缺是不少艺术家一个明显短板。一段时间里，人们可以从媒体上读到众多文辞优美的“心灵鸡汤”，哲学的思辨很快可以指出，为数众多的“心灵鸡汤”仅仅奢谈个人修养而缺少社会维度，往往是无力回应时代的表征，是廉价的安慰剂。

科学素养。在历史、哲学之外，多数艺术家还亟待提高科学素养。倡导一定程度涉猎科学知识并非为催生科幻作品，而是考虑到一个愈来愈明显的迹象：科学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艺术家来说，缺乏基本的科学知识可能导致大面积的生活盲区。从卫星电视、手机、高铁、互联网、大数据到转基因、人工智能、3D打印，科学技术正在许多领域重塑人们的生活观念。表现金融领域的作品不了解电子系统如何支持金融产品，涉及侦破、间谍题材的作家不熟悉各种特殊器材窃听、监控以及反侦查功能，他们的作品多半走不了多远。艺术家可能认为，文艺从属于人文领域，科学技术活跃在自然领域，二者分疆而治。但不得不指出的一个重大动向是：许多先进技术正在显露进驻人文领域的强烈意愿。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意识，什么是美，什么是真，科学技术正在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一套异于传统的答案。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带来传媒巨大变革，一个新型视听体系已经出现。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传媒变革迟早将带动文艺形式创新，这个课题与未来的文艺高峰密切相关。

文艺高峰是许多艺术家孜孜不倦的追求，然而，只有强大的艺术家主体才有条件问鼎这个目标。《文心雕龙》曾经如此描述古典作家的才学积累，“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辞锋”。一流的艺术人才有一流的文艺，今天这一时代对艺术家主体锻造提出更高要求。站在思想高地，实现历史感、哲学观念、科学素养的融会贯通，将有助于艺术家更为深刻地洞察这个复杂的时代，将观察与思考融入创作之中，拿出时代呼唤的杰出之作。

（作者为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帆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型。要想写出这个时代的厚重之作，强大的艺术家主体是前提条件，历史感、哲学观念、科学素养的融会贯通将有助于艺术家建构思想高地，洞察时代气象，创造文艺精品

由绕开一个问题：有多少配得上这个时代的厚重之作，又有多少艺术家具备打造厚重之作的雄心和才能？

不少人惊讶于电视屏幕、电影银幕或者互联网上的喜剧为什么如此盛行，这些蜂拥而至的作品为什么不断重复同质的美学风格？古典喜剧的笑语隐含价值立场和批判精神，现今更多喜剧却仅满足于“搞笑”，卖弄机灵抖个包袱或者展示一下“段子手”的俏皮。这种状况显然缘于市场驱动。娱乐精神将喜剧遴选为市场宠儿，令许多文艺创作者趋之若鹜，进而深刻地影响喜剧这一艺术形式在今天的表现形态。再如对“类型化”的膜拜。传统文艺评价体系往往给予“类型化”负面定位，认为其意味着独到艺术发现、富于个性的想象与体验以及异乎寻常的艺术形式的缺乏。现今，大量流行文艺创作争相以“类型化”将故事导入相似的槽模，削减审美陌生感，利用似曾相识保证观众与读者最大限度的接受。这种固定模式会抑制艺术探索现实的更多视角，限制主题展开的更多可能。许多艺术家已经意识到类型表面丰富之下的内在贫乏。他们曾感叹，现实生活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艺术的想象范围和表现体系——这种感叹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力不从心是这些艺术家的共同苦惱。

### 历史感、哲学观念、科学素养融会贯通，是创作者强主体、破瓶颈的关键

从文化市场、消费群体到艺术运作机制，艺术家的苦惱有多方面原因。在我看来，艺术家主体是最重要的因素。艺术史表明，那些目光如炬、思想深邃、富于创新精神的艺术家往往有勇气拒绝利诱，坚持己见；他们的目标是以令人惊叹的艺术质量征服读者、开拓市场，而不是毫无主见地迎合乃至投机。“目光如炬”“思想深邃”“富于创新精神”不可能一蹴而就。艺术家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这个时代提出的问题必须置于一个开阔的思想平台予以重新认知与定位。在我看来，历史感、哲学观念与科学素养构成了这个思想平台的三个重要元素。

## 现实感来自精准叙事

季亚娅

一种惯性书写是对现实的照搬照抄，新闻事件被这类写作者飞速、简单地嫁接进小说叙事，现实题材作品变成媒体故事和网络段子串烧——不分青红皂白把热点事件塞进小说，罗列事实替代深入思考，人物缺乏情感动机和内心变化，使小说变得艳俗又吵闹，注定无法引起读者共鸣。

这当然不是我们需要的“现实主义”。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而复杂，它需要在文学那里找到相应呈现，而不是惯性的旧表述。现实主义的现实感来自惯性书写，恰恰相反，它来自精准叙事。

现实题材文学的生命力往往就在于对新人新事物新现象迅速且精准的回应。有人提出，安娜·卡列尼娜自杀为什么要跳火车而不是投河跳井？因为火车在19世纪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的网络，那个时代最敏锐的心智都在讨论它，这是一次文明意义上的改变，是19世纪人类精神和新兴工业文明的一次交织，它意味着全新的时空观念和伦理价值观的出现。托尔斯泰选择火车作为叙事背景，暗合小说现实主义方法的一条衡量原则：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这样的时代。现实感就来自这样的精准。再如，被认为是近年来中国小说重

要收获的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与路遥笔下的高加林有相似的人生轨迹，但是作家将陈金芳这一形象深嵌于30多年来城乡流动加快的当代中国，她的故事完全不同于路遥描写的高加林，因为写出新境遇下的新人物，所以让人信服，让人感同身受。

精准书写、深入开掘，这样的现实主义才是丰富而有活力的现实主义。它可以是情感的现实主义，因为情感变化是人物行动和大历史的前兆，张悦然《茧》正是向人物内心寻找历史动机的这类探索；它可以是地域的、差异的唯物主义，城乡不同的社会现实和人际关系带来不同的情感结构和伦理道德，必然不能沿用相同的叙事模式，《繁花》《南方的秘密》这类作品就提供了地域文化的视角；它还可以写出现实中的变化，这也是摆脱惯性认知的有效方式，现实永远在自我革新，只要写出新的变化，你的小说就是新的，这正是“现实”的魅力。对于一些新现实，不妨借鉴非虚构写作的“接地气”方式，深入体验，生动记录，新题材新表现新生气。比如，年轻一代“数码原住民”究竟如何在虚拟现实中交往互动、如何操练网络语言、如何在网络世界投射现实



### 现实生活比艺术想象更丰富，这是文艺创作遭遇的时代挑战

历史上，文艺高峰的崛起既有必然因素，又有偶然因素。一批卓越乃至伟大的文艺家显然是文艺高峰出现的先决条件。无论屈原、杜甫、苏轼、曹雪芹还是荷马、莎士比亚、贝多芬、普希金，他们出生的时间、地点无不偶然，人们无法按照设计蓝图预先制造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出来。与此同时，任何艺术家都置身特定的社会历史之中。社会历史环境可能催生和激励艺术家的杰出才能，也可能阻碍和延迟不同凡响的艺术创造，二者之间的互动存在一定规律。今天我们来认识这种“互动”，需要留心它可能体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高额票房是一种互动，艺术基金赞助是一种互动，文艺批评带来的激烈争论也是一种互动。社会历史环境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样。

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缔造了一个文艺高峰。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的许多作品业已成为文学史铭记的经典。这一批作家的集中出现可以归因于历史提供的“天时”：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替形成巨大压力，他们以文学“呐喊”将这些压力释放出来。但作家自身素质构成文艺高峰的先决条件——他们多半置身于中西文化交汇的漩涡，曾接受良好教育，具有突出的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这些均是他们被历史选中的理由。

进入21世纪以来，新的文艺高峰成为人们强烈期待。这种期待隐含历史必然。尽管现今面临的形势与五四时期迥然不同，但是，许多作家察觉到另一种“天时”以及历史赋予文学的重任：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巨大转型，经济、政治、文化无不发生深刻改变，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巨大转型已经远远超出历史既有概念和表述，以各种具体生活形式展开，潜入千家万户。传统社会关系正在发生意味深长的调整，年轻一代的生活观念、价值判断乃至衣食住行无不显现某些前所未有的特征。总之，20世纪80年代迄今，一个斑斓的时代已经出现，众多感触不断激起文艺家的创作欲望，必须为这个时代写出一些什么！一大批文学出版物已经出现在读者面前，不少电影、音乐、绘画和戏曲作品受到关注，一些影视作品创造了惊人收视率，尽管如此，仍然没有理

现实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而复杂，它需要在文学那里找到相应呈现，文学的现实感不是来自惯性表达，而是出于精准叙事

作为文学期刊一线编辑，我每天面对大量自称“现实主义”的小说来稿，但作品带来的现实感并不让人满足。有时候翻开一部农村现实题材新作，仿佛读过上百遍一样的熟悉气息扑面而来，索然无味。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中现实感缺失，究其原因，在于现实主义本应是一种有效的观察方式和书写方式，但在某些写作者那里却陷入惯性泥潭，致使其观察和书写运转失灵。

现实主义的惯性书写有两个突出表现。一是仿写经典，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典范，于是今天衍生出不少关于苦难、奋斗、人道主义的仿作，不去思考今天的乡村相对于高加林、孙少平的时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

